

专题探索

乡村体育赛事何以实现“由村到国”?

——基于“村BA”的制度逻辑视角

张继亮¹, 高晨², 何苏洋³, 张浩森³

(1.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200; 2.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3.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 举办乡村体育赛事是发展乡村体育产业和促进乡村振兴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乡土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和中国国家治理模型建构分析框架,运用嵌入式案例研究法对“村BA”赛事的制度化进行逻辑模型系统分析,发现“村BA”赛事的制度化是基层社会的共同体逻辑、地方政府的行政逻辑和中央政府的国家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个体情感凝聚和多元发展需求在制度逻辑的形塑下促进了乡村体育赛事的形成,地方政府在纵向回应性压力和横向竞争动力的影响下推动制度创新,中央政府通过议程设置和政策反馈正式将其纳入国家级体育赛事。在此过程中,媒体动员发挥了链接制度逻辑、凝聚社会焦点和拓展制度场域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村BA”; 制度逻辑理论; 乡村体育赛事; 乡村振兴; 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25)11-0074-13 **DOI:** 10.16099/j.sus.2023.09.20.0002

1 问题的提出

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和平稳过渡是“后脱贫时代”的主要议题。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发展文旅,兼顾治理”的乡村振兴方向,与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理念相合。在共同富裕的时代浪潮下,探索“体育+乡村振兴”路径成为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内容,为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契机。

以体育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能将源于生活的文体活动规范化,使之成为国家体育赛事。在我国体育制度建设中,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发挥主导作用,并取得重要成果^[1],但该模式也引发发展不均衡、功能不完善、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较低等问题^[2]。为保持体育赛事的生命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自下而上式制度建设路径愈发受到关注^[3]。自下而上的制度建设路径围绕乡土民情展开,为体育赛事的制度化发展提供从基层到全国的研究视角。由此,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能够揭示体育赛事制度化的不同侧面,为探索从活动到赛事的转变提供学术尝试机遇。

2022年8月,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被广大网友冠以“村BA”美名。2023年6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的通知》,标志着“村BA”正式成为国家级体育赛事。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村BA”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作为繁荣乡村文化、增强乡村自信的重要途径,肯定了“村BA”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作为一项兴起于民间的文体活动,“村BA”赛事仅用不到1年的时间便从“乡村”走

收稿日期: 2023-09-20; 修回日期: 2024-09-0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N2214003)

第一作者简介: 张继亮(ORCID: 0009-0002-8038-6179),男,山东日照人,山东大学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 治理理论、基层治理, E-mail: zhjlywn@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 张浩森(ORCID: 0000-0002-1127-1872),女,辽宁沈阳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社会保障、社会政策, E-mail: gjilian_zhang@126.com

向“全国”，并引发各级政府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该赛事迅速制度化不仅为探索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制度逻辑提供了典型个案，还为揭示“体育+乡村振兴”的一般化路径提供了线索。

然而，“村BA”赛事的制度化过程并未遵循传统的自上而下式从国家层面向基层实践单向推动的制度化实践模式，也不符合自下而上式地方创新然后上升为国家制度的实践模式。它彰显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体育创新经验上升为地方政府正式制度，并最终成为全国层面正式制度的重要价值。在从民间自发的体育活动转变为国家层面推广的制度化体育赛事过程中，哪些制度逻辑驱动赛事纵向制度化进程？在这些制度逻辑的互动过程中，哪些行动主体发挥了作用？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除了作为结构要素的制度逻辑以及作为能动要素的各类行动主体，其他因素是否也起作用？为了更为细致地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运用个案嵌入式案例分析方法，深入挖掘“村BA”赛事的发展历程，直观呈现其从民间文体活动到国家体育赛事的制度化路径，分析其制度化的发展过程，揭示驱动赛事迅速纵向发展的制度逻辑，以此为基础对包括体育政策在内的国家政策多轮次迭代式制度化规律进行总结与阐释，并为相关实践提供借鉴。

2 文献述评

体育赛事是一种提供竞赛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特殊事件，是竞赛规则、民间习俗、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系统体现，其制度化过程是行政力量对赛事举办、赛事参与、赛事监督评价等流程的明确规范。学界对体育赛事制度化的研究起源于对文化活动中习俗、经验与实践的观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要素^[4]，这些要素通过内部与外部相互作用，推动体育赛事的制度化发展^[5]。

内部要素指体育活动自身具备的历史文化、精神内核与开展形式。通过融合地方文化与秩序规则，体育活动能够持续吸引参与者实践，不断增进族群、社会与国家的联结，为体育活动向体育赛事发展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6]。外部要素则关注政府行政与时代环境发展对体育赛事制度化路径的塑造。从制度化内涵看，体育赛事的制度化通常被视为官僚化和正规化的过程^[7]。政府通过纵向行政科层和横向分权治理，不断建立主体协同模式，完善赛事制度建设。在内部要素

和外部要素共同作用下，政府通过自上而下对体育赛事规范化建设与管理实现体育赛事的制度化发展，同时体育活动也通过自身特有的文化实践对赛事制度建设产生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8]。

为深入探究体育赛事制度化的发展路径，学界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一是基于历史文化条件和时代背景对体育赛事制度化和变迁历程进行深入分析的质性研究。此类研究主要关注体育活动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发展变迁及其与现代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旨在揭示体育活动的规范性特征，为体育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9]。通过路径样态的类型划分，研究对体育赛事形成和发展的不同模式形成了充分认识，指出赛事实现社会化和制度化的可行方向^[10]。为深入剖析体育赛事制度发展的内生动力，学者^[11]对典型赛事进行案例分析，包括追踪赛事发展过程、理顺赛事发展逻辑、分析主体行动策略并预测未来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研究透视体育赛事制度与国家社会治理的关系，以“相互在场”的理念深化体育赛事的制度化动力^[12]。二是侧重于关注各类影响因素对体育赛事制度发展的作用，运用量化方法探究分析具体影响机理^[13]。三是综合质性与量化研究优势设计混合研究，实现理论建构、典型案例与量化数据的有机结合，全面呈现不同要素对体育赛事制度发展的影响过程^[14]。

在我国体育赛事发展的具体环境中，现有研究紧跟国家政策，讨论体育赛事制度化与我国政策方针的联系与影响，呈现出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特点^[15]。一方面，发展体育赛事、建设体育强国与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的目标要求相符^[16]，能够提升乡村“造血”能力，促进城乡融合与经济发展^[17]。另一方面，体育赛事在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是探索“体育+”常态化治理方式的重要渠道^[18]。通过文化培育^[19]、大众传媒^[20]、合作生产^[21]等方式，能够有效实现体育赛事制度化对基层治理、民族发展、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为未来“体育赛事制度化”与“体育赛事制度影响”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指明方向。

总体而言，学者^[22]对“体育赛事制度化”这一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通过不同研究切入点和研究方法初步探讨了多元主体间的互动方式和协同逻辑，从宏观层面展示了一幅体育赛事制度化的“全局图景”。在我国，政府主导的制度化进程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为主，地方政府更多地承担执行职能，社会力量参与总

体较少^[23]。一方面, 现有研究对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特殊内容和具体细节剖析不足, 忽视了微观层面乡村体育活动的非正式制度与宏观层面国家级体育赛事正式制度的互动。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 现有研究更多地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上式研究视角切入, 鲜有研究从自下而上的视角或结合上下两方面特点探讨基层/地方的体育实践创新如何转变为国家政策或制度。或者说, 现有研究缺少解释发源于民间体育活动的乡村体育赛事“因何形成”“如何形成”, 以及“如何被国家承认”的问题。简言之, 现有体育赛事研究缺乏一条解释体育赛事纵向制度化的线索。为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 本文阐释乡村体育赛事何以“由村到国”, 通过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揭示制度化的内生动力和一般机制。

3 分析框架: 制度逻辑视野下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跨层级互动

“村BA”赛事的制度化解跨越了乡村、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3个场域, 体现出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的跨层级互动。本文将“村BA”赛事的制度化解分析置入中国国家治理场域, 并依托制度逻辑理论充分展现多元主体的跨层级互动过程, 建构一个复合的制度化解分析框架。

3.1 制度逻辑理论

制度逻辑是一种由社会建构的、关于文化象征与物质基础的历史模式^[24]。该模式具有固定的结构性要素, 包含从日常活动到制度的一般规律, 能够用于分析制度、个体和组织在社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25]。制度逻辑多种多样, 包括国家、市场、专业与公司等不同类别, 这些制度逻辑类型在实践中相互影响^{[25]59-72}。在单个制度逻辑内部, 制度实践沿着“微观—中观—宏观”的路径进行边界扩散。而且在这个扩散过程中, 不同制度实践相互衔接转化, 影响议题的层级跨越与行动者的身份建构。

具体而言: 在微观层面, 制度逻辑通过文化聚焦个体情感, 引导个体建构身份认知并确定行动目标^[26]; 在中观层面, 个体间的情感认同沟通了国家与社会^[27], 使多元主体因相同的目标构成组织,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组织目标, 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员^[28]; 在宏观层面, 具体的制度实践逐渐向抽象的制度逻辑转化, 形成更高层次的模式化制度逻辑^[29]。当宏观层面制度逻辑形

成, 制度变迁进程将通过文化再次影响个体和组织的注意力, 奠定再制度化的基础^{[25]99}。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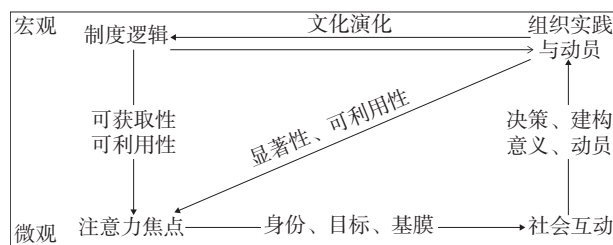


图1 宏观—微观和微观—宏观相结合的制度逻辑互动模型

Figure 1 Cross-level model of institutional logic combining macro-micro and micro-macro

制度逻辑理论为理解我国国家治理实践制度化, 特别是体育赛事纵向制度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但该视角对分析我国国家治理的垂直式多层级制度逻辑作用有限, 为了更好地分析我国国家跨层级治理的实际情况, 特别是我国体育赛事制度跨层级流动的实际情况, 需要借鉴我国国家治理逻辑模型。

3.2 中国国家治理逻辑模型

特定治理模式下的权力运行机制会对各级行动者推动制度创新的角色变迁、制度逻辑与行为选择造成影响, 是分析制度逻辑必要的宏观背景。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建构包括“中央权威-地方权力”和“国家-社会”两对关系性线索, 分别从国家组织制度安排和社会建设2个维度呈现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性视角^[30]。在央地关系的线索中, 中央通过晋升锦标赛控制干部的人事管理, 以行政力量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31]。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参与晋升锦标赛的地方官员为吸引上级注意力资源, 会依据环境条件变化调整行政事项的优先次序, 释放积极的创新信号^[32]。在政社关系的线索中, 社会热点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影响政府议程设置, 为制度创新提供动能。政府对社会热点的回应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和治理效能, 推动了新制度的生成与完善。因此, 中国国家治理逻辑涵盖基层共同体逻辑、官僚逻辑和国家逻辑3种制度逻辑。其中, 基层共同体逻辑是指人们基于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各种渠道构成的亲密关系, 官僚逻辑是指压力型体制与激励机制驱动下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思维, 而国家逻辑包含政策目标的制定以及根据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进一步完善相应政策^[33]。

3.3 制度逻辑分析框架

基于制度逻辑理论, 结合中国国家治理逻辑模型,

本文试图分析在不同制度逻辑形塑下,“村BA”如何从位于乡村共同体的非正式制度演变成正式国家制度,揭示“组织正式化”与“赛事制度化”的互动关系。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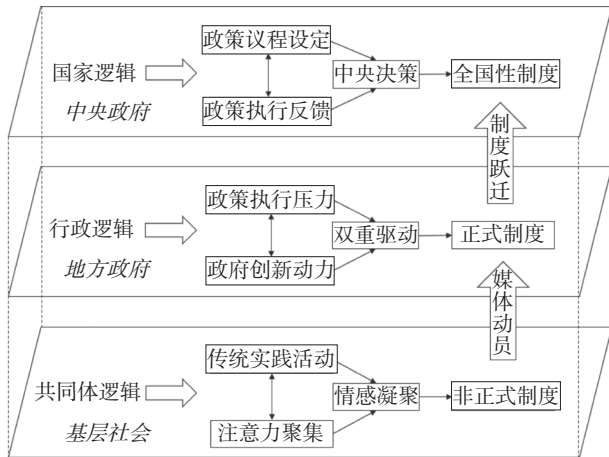


图2 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制度逻辑分析框架

Figure 2 Institutional 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events

3.3.1 源于基层传统实践: 共同体逻辑驱动下乡土社会的情感凝聚与非正式制度的扩展

共同体逻辑指的是, 基层社会层面个体与集体行动者依据传统实践或情感互动自发形成的行为模式, 这为正式乡村体育赛事非正式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共同体基础。在共同体逻辑的基础上, 相关个体行动者在相关动机的驱动下, 促进了乡村体育赛事非正式制度的扩展。例如, 乡村精英在致富动机的驱动下通过网络宣传村庄实践中的一些传统体育活动来实现赢利目的。在这一过程中, 乡村体育活动的知名度得到提高, 反过来会进一步凝聚人们对村庄共同体的情感, 从而使共同体逻辑得以强化, 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非正式制度。这些得到强化的非正式体育赛事制度为其后来成为各级政府正式制度奠定了基础, 之后它们会借助各种渠道或机制迈入政府议程, 成为正式体育赛事制度。

3.3.2 从基层社会到地方政府: 行政逻辑驱动下基于双重动力的正式制度探索

行政逻辑指的是, 在压力机制和创新机制的驱动下, 地方政府将各种非正式的体育制度转化为正式的体育制度。具体而言: 一方面, 地方政府需要回应来自中央以及上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 而且这些政策要求的执行并不是简单的照单完成, 而是需要完成逐级加码的政策, 特别是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

样备受重视的政治性任务^[34]; 另一方面, 创新机制指地方政府官员或部门间通过各种努力来争夺上级领导的注意力而取得在财政资源或晋升方面的竞争优势。在这一机制的驱动下, 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不同职能部门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寻求各类创新。行政逻辑为体育赛事的正式制度化提供了需求, 从而为处于共同体层面的以非正式制度形态存在的体育赛事正式制度化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35]。

3.3.3 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 国家逻辑驱动下议程设定与反馈的全局性制度建构

国家逻辑包含中央政府政策议程设定与政策执行反馈两部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地区差异较大, 中央政府重在根据当前的发展需要来制定各种一般性的目标或方针, 然后交由省级以下地方及基层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并执行, 并根据地方政策制定与执行情况进一步修正最初的目标设定与方针。在这一逻辑驱动下, 由共同体逻辑和行政逻辑共同形塑的乡村体育赛事制度创新成果进入中央视野, 至此, 国家级体育赛事正式产生, 乡村体育赛事制度化宣告结束, 乡村体育赛事迈入全国范围内的制度推广阶段。

4 研究设计与案例呈现

通过理论阐释与框架建构, 形成了共同体逻辑、行政逻辑和国家逻辑推动乡村体育赛事制度化的基础性论断。为保障理论建构的充分性, 本文在研究设计部分既论证共同体逻辑、行政逻辑和国家逻辑的作用机制, 又关注三类制度逻辑的衔接关键点, 明确乡村体育赛事制度化的因果机制。运用嵌入式案例分析法建构逻辑模型可清晰呈现制度逻辑的形成与发展机理, 依托实践案例检验现有理论认知。

4.1 研究方法

嵌入式案例分析是一种案例研究方法, 通过对主分析单位和多个次级分析单位进行分析考察, 详细分析多元行动主体和变量以得出对主分析单位的研究结论^[36]。该方法通过多个次级分析单位进一步呈现主分析单位的全貌, 适用于涉及多个分析单位的案例研究, 能够在理论框架部分建立基础性论断的基础上深化次级分析单位与主单位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因果机制, 并通过案例对制度逻辑形塑制度的一般模式进行检验。其中, 主单位是“乡村体育赛事的制度化”, 3个次级分析单位分别是“基层社会”、“地方政府”和“中

央政府”。主单位与次级分析单位呈现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次级单位之间既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治理格局,又具备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到国家级制度的跃升关系。

4.2 资料收集

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政策文件收集和时事热点新闻整理还原案例发生的整体过程并分析内在机理。第一,实地访问,团队于2023年5月参与贵州省台盘村篮球文旅活动并协助部分工作,对当地风土人情和“村BA+”运营模式进行参与式观察。第二,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在“村BA”发源地获取支撑案例分析的一手资料。2023年5月至2024年4月,团队持续对村级、县级、省级有关部门干部进行访谈,访谈对象涵盖参与“村BA”赛事制度化的人员代表,并充分考量多元行动主体的观点。第三,搜集各层级官方政策文本、政府公报、领导人批示以及村民大会和行业协会的公告,了解赛事制度化的焦点事件和关键时间节点,对因果机制进行佐证。第四,整理中央和地方的官方媒体以及自媒体的新闻报道,通过舆论传播内容探析该赛事的制度化过程。

综上所述,通过对访谈记录、政策文本、官方通告、新闻资讯的收集,获得了较为丰富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表1)支撑。上述资料涵盖纵向行政链条的各个层级,又包括社会多元主体,能够佐证“村BA”赛事产生、发展、扩散等不同阶段之间的因果关系,体现宏观与微观的互动过程。

4.3 案例呈现

篮球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拥有较为广泛的受众基础。在贵州省台盘村,村民自发将篮球运动组织成村镇联赛,逐步掀起全国“村BA”浪潮。2022年8月至2023年6月,“村BA”爆红网络,在1年内发展为全国赛事,体现了“组织正式化”与“赛事制度化”两条相互促进的关系性线索。本文将贵州“村BA”赛事作为乡村体育赛事制度化研究的切入点,基于赛事的时间发展顺序和不同层级制度逻辑的深层次互动,探讨制度逻辑视角下“村BA”赛事制度化的因果机制,动态呈现贵州“村BA”赛事“由村到国”的制度化路径(图3)。

4.3.1 基层社会系统:传统与情感视角下的民间乡村体育赛事

台盘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乡,被誉为“天下苗族第一县”。当地篮球文化源于“六月六”

表1 案例资料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case data

数据类型	层级	资料来源	主要内容	编号	
一手资料	村	台盘村村支书	台盘村篮球赛事的发	CTPZF01	
		台盘村村委主任、 篮球协会会长	展历程、关键人物和 事件、办赛思路和未	CTPSH01	
	县	县招商局局长	来发展方向、乡村振 兴的招商引资思路、	XTPZF01	
		台盘乡乡长	上级部门的制度安 排、参赛和游玩感	XTPZF02	
		台盘乡村振兴公司负责人	受等	XTPZF03	
	省	台江县体育局工作人员		XTJZF01	
		台江县县政府工作人员		XTJZF02	
		贵州省体育局工作人员1		STYZF01	
		贵州省体育局工作人员2		STYZF02	
		贵州省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		SXCZF01	
社会	篮球运动员		SH01		
	村民		SH02		
	游客		SH03		
二手资料	村	台盘村村委会	台盘村村规民约		
		县	台江县人民政府官网	台江县人民政府公告、 台江县新闻资讯	
	省	贵州省人民政府官网、 贵州省体育局官网、 贵州省乡村振兴局官网	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告、 贵州省“美丽乡村” 篮球联赛实施方案等 相关政策、相关新闻 报道		
		中央	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	全国和美乡村篮球联 赛政策文本,“村BA” 有关论述	
			新闻联播、人民日报、 光明网等官方媒体	相关新闻报道	
社会	其他传媒公司、 自媒体报道	相关新闻报道、短视 频等宣传内容			

苗族“吃新节”,最早可追溯至1936年,具有“逢节必比赛、比赛先篮球”的传统(SH01)。1984年,在全国第一届农民“丰收杯”篮球赛上,台江县组建“东风女篮”农民队代表贵州省参赛。在“东风女篮”精神感召下,村民自发将篮球运动发扬光大,自筹经费筹备“吃新节”球赛并提供奖品,使篮球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文体活动。

受产业发展滞后、人才外流严重等现实问题影响,台盘村陷入发展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一批苗寨青年以发展家乡为愿景返乡创业。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创业青年决定以直播带货和乡土人情展示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在直播过程中,带货内容缺乏流量关注,而以乡村篮球赛为代表的乡村文化习俗广受网民欢迎。由此,该村网络直播的重点逐渐向直播球赛和宣传民族文化上转移。在为家乡谋发展的过程中,村干部发现村民虽然对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缺乏热情,但在打篮球方面积极主动。即便是村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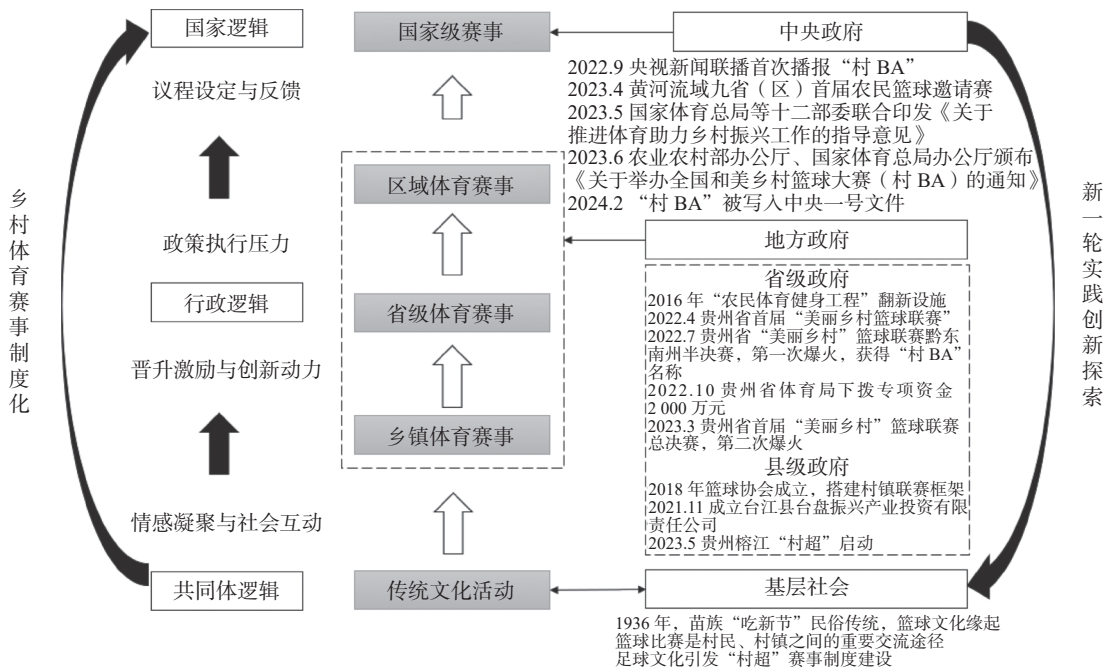


图3 “村BA”赛事制度化的动态发展路径

Figure 3 Dynamic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Cun BA"

出务工人员,也会在每年“吃新节”返乡,参与球赛组织、策划等工作。为增强乡村凝聚力、回应网友的关注,该村于2018年成立乡村篮球协会,并通过广大村民的集体决策初步搭建村组、中年组、少年组赛事框架。通过篮球协会的协调,台江县形成了以台盘村为核心的“村镇联赛”赛事雏形(STPSH01)。

2020年,一次“吃新节”直播使台盘村篮球赛事走红网络。紧张激烈的村镇篮球赛事、休息串场的民族歌舞表演、接地气的参赛奖品既传递了奔放质朴的乡土情感,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随着台盘村篮球赛事在网络平台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长期致力于发展群众体育、打出贵州体育金字招牌的贵州省体育局迅速介入,为乡村篮球赛事提供物质基础与政策支持,使乡村体育进入省政府的制度议程。

4.3.2 地方行政系统:创新动力与体制压力下的赛事制度化

贵州省体育局的迅速行动源于政治目标的现实压力和争取注意力资源赢得晋升锦标赛的竞争动力。一方面,贵州省GDP水平在全国排名中下游,脱贫攻坚和防止返贫压力较大。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贵州省急需释放乡村自主发展的振兴活力,获得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贵州省体育局在政府职能部门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对获得注意力资源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长期以来,贵州省体育局一直关

注乡村体育事业发展的最新动态。早在2006年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中,贵州省体育局便开始推动乡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贵州省体育局对乡村体育设施进行更新,实现“一场两台”全覆盖,为台盘村提供了第一个标准化篮球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贵州省体育局积极探索以体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途径。基于多次实地调研经验,当台盘村篮球赛事取得一定的网络知名度后,贵州省体育局决定迅速整合办赛资源,打造五级联动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品牌,实现篮球、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

2022年4月,贵州省开办首届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并于同年5月召开“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新闻发布会,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开展乡村体育赛事规范化探索。在省府政策议程的推动下,中共台江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更是强调抓住“村BA”爆火契机,实现体育赛事与乡村振兴的结合,做好以赛助旅、以赛扶产、以赛彰文等工作。2021年11月,台江县台盘振兴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孵化2200余个直播营销团队,通过“乡村振兴公司+”模式引进实业,增强乡村篮球赛事的影响力和乡村振兴效能。2022年7月至8月,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黔东南州半决赛吸引全网广泛关注,获得比肩“NBA”“CBA”的“村BA”称号。2022年10月,贵州省体育局下拨2000万元专项资金,进一步完善体育公共服务

设施。2023年3月25日,贵州省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台江县台盘村打响,使“村BA”第二次爆火。首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共组织民间篮球队2624支,完成比赛5501场。第二届“美丽乡村”篮球联赛持续火爆,各项数据翻倍增长,共组织民间篮球队4000余支,参与人数48730人,完成比赛11455场,比赛期间覆盖800余万人。

贵州省体育局工作人员在访谈中提到:“台盘的成功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在自媒体宣传的速度太快了,后疫情时代人们需要一次彻底的释放。必然在球赛文化的纯粹性,男女老少都能参与进来,与社会产生共鸣。我们也非常关注比赛开展,支持他们保持自己的特色。”(STYZF01)

贵州“村BA”的成功影响广泛,迅速吸引了中央层面的关注和其他省份的学习。2023年4月到6月,其他地区各级政府通过区域特色挖掘和协同合作等方式纷纷探索本地区乡村篮球联赛的发展模式。2023年4月27日,黄河流域九省(区)首届农民篮球邀请赛开赛。不同省级行动者通过区域联动形成区域性乡村篮球联赛,为中央赛事制度的整合提供了实践基础。

4.3.3 中央国家系统:国家级乡村体育赛事制度的整合与发展

中央政府背负国家治理的重要责任,通过议程设置与监督反馈推进制度化进程,驱动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意志、实现制度目标。贵州“村BA”的成功与其他地方的广泛探索使“体育+乡村振兴”的有关议题进入中央视野。2022年9月3日,央视新闻联播进行“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生活品质”专题报道,将贵州“村BA”作为乡村振兴的典范。在贵州“村BA”举办期间,贵州省人民政府、省体育局等部门多次汇报办赛经验,介绍了“服务人民,扎根沃土”的成功模式,不断增强中央吸纳基层实践经验、整合各省办赛成果的意愿。除贵州省乡村体育赛事的成功规模化,其他省市的自行办赛与跨区域合办均向中央释放积极信号,坚定了中央以体育运动为抓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信心。

2023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等十二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了在全国培育100项以上最美乡村体育赛事的行动计划。2023年6月,《关于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的通知》的出台标志着“村BA”从基于情感互动的乡村文体活动转化为国家级规范化的乡村体育赛事制度。在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等多部门

指导下,“村BA”正式成为国家级赛事。姚明、马布里等明星通过亲临赛场和网络“站台”等方式参与其中,进一步提升了“村BA”的赛事影响力。2024年1月,“村BA”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至此,“村BA”在短时间内实现剧烈制度化。

“村BA”赛事的正式化与规范化意味着国家给出了“体育+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作为“村BA”发源地,台江县颁布《台江县招商引资优惠措施(试行)》《台江县特色农产品产业招商优惠扶持政策》等多项政策法规,在保证篮球比赛“原汁原味”的同时引进实业提升“造血”能力。贵州省体育局在《“土味满满”的贵州群众体育》报告中提到:2023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接待游客7879.45万人次,同比增长25.75%,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75.82亿元,同比增长37.01%;“村BA”举办地台江县接待游客289.14万人次,同比增长74.8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3.33亿元,同比增长94.66%,取得了以体育促进发展的显著成果。伴随“村BA”赛事的成功,“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等内容于2024年2月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至此,“组织正式化”和“赛事制度化”两条线索在实践中走向融合,“村BA”从群众体育赛事转化为国家级规范化体育赛事,探索出“体育+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

5 案例分析:“村BA”赛事制度化的制度逻辑

“村BA”从文体活动到体育赛事的发展是一个短时间内迅速制度化的过程。该过程并非由单一行动主体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的制度逻辑影响下,经过一系列跨层级动力传递和压力传导的结果。为系统分析这一复杂过程,采用逻辑模型法,通过形成一定时期内各个事件之间复杂而精确的链条,展现“原因—结果—原因—结果”的因果机制,逐步“打开黑箱”^[37]。制度逻辑是影响行动主体行为选择、推动议题层次上升的一般规律。在共同体逻辑、行政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共同形塑下,“村BA”逐步实现“组织正式化”与“赛事制度化”,正式转变为全国性体育赛事制度。

5.1 共同体逻辑的助推:传统文化与发展需求中的情感互动

5.1.1 基于传统/情感的共同体逻辑与媒体聚焦强化的非正式制度

基于长久实践形成的共同体逻辑,返乡精英在发展动机的驱动下,不断在网络上直播篮球赛事,随着关

注度的提升,进一步凝聚了村民之间的情感,并使其逐渐成为体现当地村民民族自豪感、集体荣誉感和乡村自信的特殊符号。随着赛事影响力不断扩大,大量村民参与赛事组织、场地修缮、奖品筹集等集体活动,使得乡村情感不断凝聚,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逻辑。这一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体育活动在共同体逻辑驱动下不断获得增强。在媒体聚焦的影响下,当地形成了以台盘村为中心、辐射多个村镇的非正式篮球赛事制度,并推动集体决策形成村镇篮球联赛。

5.1.2 多元需求下的社会互动完善非正式制度并促进其制度化发展

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了农村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篮球赛不仅是当地村民寄托情感的传统文化符号,也是振兴乡村、谋求美好生活的现实制度需求。这种振兴发展需求为篮球赛事丰富了共同体情感,使更多个体将注意力聚焦于篮球赛事。正如台盘村村委主任、篮球协会会长所说:“最开始的直播内容是做农村电商,没多大热度。偶然间直播了一场篮球赛,带来了巨大的流量,这时我们就想能不能把篮球作为宣传的主要方向。”(CTPSH01)自媒体的下沉赋予社会公众更多传递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在数字传播中进一步扩大了共同体逻辑的情感沟通场域。“村BA”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方向存在一定的偶然性。随着球赛网络影响力的增加,台盘村自发成立篮球协会,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制定规范赛事的村规民约。在台盘村的带动下,各村镇篮球联赛得以整合,推动了更高层次的社会互动,为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化创造契机。此时,村镇篮球联赛不再只是基层社会基于村落情感自发形成的体育活动,更是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创新基层治理的可行途径。在媒体动员下,乡村体育赛事迅速吸引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使非正式制度上升为正式制度议程。由此可见,“村BA”的制度化有其内在必然性。

5.2 行政逻辑的驱动:双重动力的助推形成地方体育赛事制度

5.2.1 乡村振兴的纵向回应性压力驱动地方政府实现制度目标

在压力型体制的结构下,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需要逐级贯彻落实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纲领。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时间节点,地方政府需要探索将运动式治理成果转化为常态化治理的一般模式。为实现制度目标,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

门将乡村振兴作为绩效考核指标,鼓励各行政主体的政策创新性执行。因此,地方政府需要落实制度目标,并“层层加码”保障执行成效。

与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制度压力方向相反,自下而上的社会需要与制度期待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回应性压力。当乡村自发形成规模性体育赛事,广大村民对赛事和组织两方面的制度化需求与日俱增。来自乡土社会的情感互动不断向地方政府传递制度化的积极信号,推动乡村体育赛事进入政府制度议程。“只有尊重民俗文化 with 群众意愿,响应基层体育需求,才能挖掘赛事潜力实现乡村振兴。”(STYZF02)正如贵州省体育局工作人员在访谈中指出的那样,地方政府在回应基层需求时,必须考虑到民俗文化和群众意愿,以确保制度化过程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5.2.2 晋升锦标赛与横向竞争性动力激励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晋升锦标赛是影响干部晋升的关键机制,获取上级部门的注意力是官员在人事流动中取得优势地位的重要途径。参与晋升锦标赛不仅需要经济发展层面取得优势,还可以通过创新其他社会治理环节围绕注意力这一稀缺资源展开竞争。

一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这种吸引中央注意力的竞争加速了地方政府的制度学习,迅速推动“村BA”的自发扩散。作为经济发展不突出的省份,贵州省长期致力于寻求创新发展的比较优势,具备以文化旅游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强烈意愿。伴随台盘村篮球联赛规模的逐步扩大,自媒体传播不断发挥增进情感活动和拓展制度场域的作用。贵州省人民政府和体育局迅速捕捉创新切入点,推动乡村体育赛事进入制度议程。贵州省“美丽乡村”篮球联赛的成立标志着来自台盘村的篮球联赛正式制度化,并引发更大规模的制度学习与政策扩散。“好的赛事需要更好的宣传。通过与中央和省内外主流媒体合作、与体育明星线上线下互动、孵化培养短视频直播营销团队,我们始终保持赛事热度,让赛事持续升温,全面包装塑造‘村BA’超级IP。”(STYZF01)这些策略促成了“村BA”赛事的爆火,进而引发更多地方政府的制度学习与制度模仿,使“村BA”的制度场域得到进一步扩展。为体现出新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进一步在赛事规模和赛事组织环节取得突破。“黄河九省(区)首届农民篮球邀请赛”的诞生标志着中观层面地方政府之间开始打破单一政府主体的区域壁垒,使“村BA”赛事的制度化呈

现出区域一体化的新态势。

二是政府部门间的竞争。作为“相对弱势”的职能部门,体育局在推动“村BA”赛事制度化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一方面,体育局的资金投入和场地修缮为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无论是在“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期间实现的“一场两台”全覆盖,还是“村BA”期间下拨的2000万元专项资金,均体现出体育局始终关注基层群众体育工作,积极推动文体活动向体育赛事转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体育局直接负责组织开办“美丽乡村”篮球联赛,完整参与赛区整合、赛事宣传、赛事组织的全过程。通过多次基层调研和办赛实践,体育局将“村BA”打造成贵州省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发展的招牌,使“村BA”赛事成为贵州省人民政府重点推进的制度议程。综上所述,体育局在政府部门间的横向竞争中实现了“村BA”赛事的第一次爆火和初步制度化,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则实现了“村BA”赛事的第二次爆火和进一步的赛事规模化,由此引发中央政府的关注。

5.3 国家逻辑的形塑:中央政府的制度议程与地方政策执行反馈

5.3.1 中央政府在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制度议程设定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国家需要释放乡村“造血”能力,通过探索常态化发展路径衔接运动式治理模式。随着媒体对“村BA”赛事报道的深入,地方与基层的实践经验进入中央视野。作为释放信号的重要标志,央媒开始对“村BA”赛事投入注意力。央视新闻联播对“村BA”赛事的报道肯定了地方政府探索乡村体育赛事引领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体现了中央政府在制度议程层面的关切。这一关切迅速反馈在政策制定层面,中央政府通过设立新的制度目标引领“体育+乡村振兴”制度的完善。随着“村BA”赛事的持续爆火,乡村体育赛事正式踏入制度化进程。“体育+乡村振兴”也在中央制度议程层面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

5.3.2 地方政策执行的经验反馈与国家性赛事制度完善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双动力下的政策执行与创新吸引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地方政府在发展群众体育、完善基层治理和激发乡村振兴动力上的经验反馈为国家性赛事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通过地方的经验反馈,中央能够总结制度创新的趋同性特征,提升制度的可推广性,并降低制度创新成本。把从基层社会到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成果成

功传达至中央宏观层面,推动了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推广。当村落传统/情感自发形成的体育活动转化为与乡村振兴战略相关的政治目标,中央层面通过出台政策文本的方式使非正式制度成为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关于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的通知》的颁布促进了乡村体育赛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衔接,整合了各地“村BA”赛事体系,正式构建了国家级系统赛制。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村BA”最终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治性目标。

综上所述,基于共同体逻辑、行政逻辑和国家逻辑这3种制度逻辑的共同作用,位于不同层级、具有各种动机的行为主体在媒体的作用下推动“村BA”从乡村自发的体育活动转变为国家级体育赛事制度,从而实现了“村BA”赛事从非正式制度到地方层面的正式制度再到中央层面的正式制度这一制度化转型过程。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依托制度逻辑理论对体育赛事的制度化路径进行详细分析,通过建构“传统/情感—制度”的跨层级制度逻辑研究框架,为乡村体育赛事从基于基层传统/情感的非正式制度转变为国家层面正式制度的制度化路径提供了一个中国国家治理的新视角。通过嵌入式案例分析,发现“村BA”的制度化发展受共同体逻辑、行政逻辑和国家逻辑影响,使“村BA”实现“组织正式化”和“赛事制度化”,从一项基于传统/情感的文体活动发展成为一项在全国层面推广的制度化体育赛事(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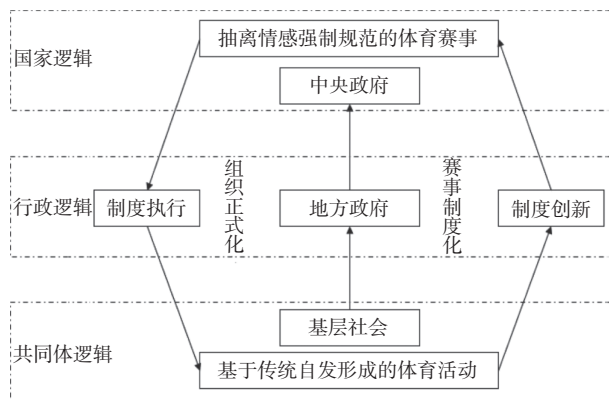


图4 制度逻辑视角下乡村体育赛事的制度化机制
Figure 4 Institutionaliz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sports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

第一,在基层社会层面,基于传统的社会共同体逻辑,在乡村精英的推动下,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乡村体育活动得到强化。传统体育活动作为共同体逻辑的载体之一,凝聚民族与地方的精神内核。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个体精英村民出于致富和乡村发展动机,通过网络传播抓住了利用篮球赛事实现赢利的机会,实现了共同体逻辑赋能村民的情感凝聚。这一情感凝聚实现了共同体逻辑力量的提升,进一步使非正式制度得到扩展。总之,传统实践逻辑、个体的赢利动机、网络媒体的力量共同强化了超越个体与组织的社会共同体逻辑。在此基础上,乡村体育赛事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使体育活动的浪潮逐步蔓延至其他村镇。这一得到强化的非正式赛事制度随着网络媒体的报道推动了地方政府将民间体育赛事纳入地方政府正式制度的进程。

第二,在地方政府层面,由结构压力和竞争动力构成的行政逻辑共同推动了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化。一方面,乡村振兴的政治目标为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设置了具体的行政任务,带来了巨大的执行压力。同时,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需要在各自的层级吸引上级政府的注意力,从而为自身所处的部门或政府层级谋取晋升机会或各种资源。这就为他们高质量完成各自层级政府或部门相关的乡村振兴任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这种由压力与动力构成的行政逻辑支配下,起源于台盘村的乡村体育赛事经过媒体的渲染,成功地吸引了贵州省人民政府与体育局等部门的注意力,从而在他们的推动下形成省级“村BA”赛事制度,而这一经过地方政府正式制度化的体育赛事活动为其下一步成为中央推广的国家级赛事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央政府在国家逻辑的驱动下,即基于议程设置与政策反馈,将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体育赛事制度实践提升为国家政策,从而将“村BA”正式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体育赛事制度。通过议程设定这一非常重要的政策制定环节,中央政府将乡村振兴确立为全国层面的重要政策目标。虽然中央政府不需要亲自执行这一政策,但它肩负着促使这一目标顺利实现的任务。因此,从政策反馈的角度出发,中央政府有责任在全国范围推广地方政府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有效政策创新实践,从而在宏观层面更迅速、有效地促使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国家治理制度逻辑背景下,经过中央媒体的报道,源自地方实

践的经验得到中央认可。中央政府将“村BA”纳入具体化的乡村振兴政策制定议程,并迅速出台相关文件,正式将基于传统/情感的民间体育活动转化为制度化、国家级的体育赛事。

在“村BA”制度化的过程中,有3个要点值得注意:第一,源自基层自发形成的乡村体育活动在社会共同体逻辑、行政逻辑和国家逻辑共同作用下转变为全国层面的正式制度;第二,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从基层、地方到中央层面的个体与部门性行为主体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从自身动机出发共同为“村BA”赛事制度化贡献了力量;第三,大众传媒发挥了巨大作用,无论在“村BA”赛事的初始阶段、正式制度化阶段还是最终在中央层面的制度化阶段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注意力凝聚或链接作用。总之,“村BA”赛事正是在3种制度逻辑、各级行为主体以及各级媒体的共同作用下才实现了由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由基层到中央的制度转变。

6.2 理论探讨与经验借鉴

制度逻辑理论能够通过沟通不同系统的行动逻辑来揭示制度建构的内在机理。目前,制度逻辑理论在特定环境中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度,例如企业战略变迁、创业策略选择、组织服务设计等。但上述研究注重在横向层面解释市场、企业、社会等“平行关系”的逻辑互动,对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作用以及跨层级的制度系统间的复杂互动剖析较少。“村BA”赛事的制度变化恰好为丰富制度逻辑理论的解释维度提供了机遇。一方面,“村BA”赛事的制度变化不仅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层面不同制度逻辑之间的互动情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村BA”赛事的制度变化揭示了乡村体育赛事这一制度在各个行为主体的作用下成功地实现了从基层到地方再到中央层面的跃升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位于基层、地方以及中央这3个垂直层面的制度逻辑在各级媒体链接作用下的互动状态。从中央—地方政策制定—执行这一研究角度来看,既有研究多从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角度出发,强调在晋升锦标赛以及压力型体制的作用下,基层以及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执行不足等政策执行偏差问题,或者基层以及地方政府开展半自主/自主创新,然后被上级乃至中央政府所采纳。但“村BA”赛事的制度变化过程表明,这种单一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央地政策制定—执行视角只是截取了整个政策制定—执行的部分

过程,未展示央地政策制定—执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复杂动态全景。基于乡村共同体的传统/情感逻辑,乡村体育赛事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自发性的、传统/情感驱动的过程。这种自发驱动形成的体育活动在新媒体的作用下,通过行政逻辑的形塑转变为地方性正式制度。随后,在中央媒体的作用下,通过国家治理逻辑的形塑上升为全国层面的制度。这种自下而上的实践经验与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迭代式的制度化过程。

从实践层面来看,为促使基层或地方政府的体育实践创新有效实现横/纵向扩散或制度化,可参照共同体逻辑、行政逻辑和国家逻辑的不同要求推动体育赛事活动快速、健康地发展。一是挖掘充满传统/情感要素的体育活动,运用大众传媒开展社会动员。根据共同体逻辑,具有生命力的体育赛事往往具备深厚的群众情感基础。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挖掘和传播体育背后的传统/情感元素,促进社群认同与参与,形成积极的体育文化,使体育活动成为情感联结的载体。二是在推进体育赛事制度化时尊重赛事精神内核,鼓励地方政府依托实际情况合理开展创新活动,避免体育赛事制度的异化,地方政府应在保障体育赛事“原汁原味”的基础上融入社会经济发展要素,从实际环境条件出发,谋求“体育+”模式的最佳契合点。三是协调制度创新与既定制度目标,抓住机遇推动制度议程设置,并关注执行反馈成果,引导新一轮制度创新。中央层面的制度创新要兼顾既定目标,使体育赛事制度创新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等国家治理战略实现。通过反馈机制,中央政府应在顶层设计上高度吸收地方政府实践经验,总结制度创新的普适性,指导新一轮的制度迭代与优化,确保体育赛事制度化进程的健康发展与持久生命力。

6.3 展望

本文以“村BA”赛事从作为乡村自发存在的非正式制度跃升为全国层面的正式制度这一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依托制度逻辑视角,运用嵌入式案例分析法分析了制度化过程中的具体机制,深化了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央地关系间政策制定—执行的多制度逻辑、多行为主体、多层次、多样化媒体的共同作用下展现出来的复杂化、迭代式的动态情景。然而,本文也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本文虽然指出了作为结构性因素的3种制度逻辑的重要作用,并且也未忽略各层级行为主体的

能动性作用,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未能深入探究各层级行动主体在面对各种非正式制度以及正式制度时所体现出的聚焦、认知、建构等细致性微观反应,而这些微观反应是理解制度逻辑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其次,本文属于探索性研究,研究结论需进一步用相似案例进行检验,例如,贵州省榕江县足球协会主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联赛(被称为与“中超”相对应的“村超”)在自媒体平台爆火,随后于2024年1月作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该赛事同样走向制度化。再次,本文依托于“村BA”赛事的纵向制度化这一体育赛事案例展开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能扩展到体育赛事之外的诸如环保、教育、经济等领域?如果需要修正,应如何修正?最后,本文基于制度逻辑视角重点突出了西方制度逻辑研究所忽略的跨层级、跨制度逻辑的解释,如何通过这一视角更具建设性地与西方制度逻辑研究展开对话,以凸显来自中国的研究视角的独特性与贡献,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作者贡献声明:

张继亮:确定研究设计,选定研究方法,设计整体论证思路;

高晨:确定论文选题,撰写、修改论文;

何苏洋:搜集研究资料,组织实地调研;

张浩淼:指导论文选题与修改。

参考文献

- [1] 马思远.我国体育锻炼标准的制度化历程与功能嬗变[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33(5):481-487
- [2] 卢文云,王志华,陈丛刊,等.以高品质生活引领新时代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3,37(1):33-46
- [3] 刘少强,侯京卫,乔璐,等.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制度困境与对策[J].体育文化导刊,2021(8):27-33
- [4] 杨海晨.族群体育与认同建构: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田野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34
- [5] LEOPKEY B, PARENT M M. The (Neo)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egacy and its sustainable governance within the Olympic Movement[J]. *European Sport Management*

- Quarterly, 2012, 12(5): 437-455
- [6] 杨铃春, 陈玉萍. 文化重叠共识: 民俗传统体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结机制: 基于富禄苗族乡抢花炮的田野调查研究 [J]. 体育与科学, 2024, 45(2): 60-68
- [7] PEARSON K.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port form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Sociology*, 1979, 14(1): 51-60
- [8] SUMMERLEY 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arl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and e-sports[J]. *Games and Culture*, 2020, 15(1): 51-72
- [9] 王子朴, 杨铁黎. 体育赛事类型的分类及特征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5, 29(6): 24-28
- [10] 柳鸣毅, 佟岗, 罗冰婷, 等. 国外青少年体育赛事研究: 制度剖析、案例分析、前瞻启示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4, 40(3): 12-16
- [11] MORROW 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port: A case study of Canadian Lacrosse, 1844-1914[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1992, 9(2): 236-251
- [12] 杨海晨, 吴林隐, 王斌. 走向相互在场: “国家-社会”关系变迁之仪式性体育管窥: 广西南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口述历史 [J]. 体育与科学, 2017, 38(3): 84-93
- [13] 王飞, 张瑞林. 赛事认同对标志性体育赛事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多中介的调节模型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55(12): 56-64
- [14] TORABI F, MOHAMMADI M. Institutionalizing the effective factors of the general culture of public sports in the society (case study: Tehran province) [J]. *Applied Research in Sport Management*, 2023, 12(2): 15-30
- [15] 杨桦. 乡村振兴中农村体育发展的机遇、问题与策略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8(5): 8-14
- [16] 邵凯, 董传升. 乡村振兴背景下体育产业助力精准扶贫的思考 [J]. 体育学刊, 2022, 29(1): 69-75
- [17] 王晓芳, 刘江宏. 农村“体育+”精准扶贫协同机制实现路径 [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0(1): 72-78
- [18] 耿迪, 何颖, 刘勇, 等. 体育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理路、困境与治理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8(5): 25-31
- [19] 徐雄, 贾宏. 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经验及展望 [J]. 体育文化导刊, 2024(3): 67-73
- [20] 王鸣捷, 白汶龙. 乡村体育文化的新媒体传播与治理: 基于“村超”的田野考察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1): 161-168
- [21] 张友浪, 冉宇豪.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基于 R 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J]. 治理研究, 2024, 40(2): 57-72
- [22] 陈洪. 我国体育制度变迁的阻力与突破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 47(3): 14-17
- [23] 沈坤荣, 金刚. 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 基于“河长制”演进的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5): 92-115
- [24] THORNTON P H, OCASIO W.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historical contingency of power in organizations: Executive success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industry, 1958-1990[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 105(3): 801-843
- [25] 桑顿, 西卡西奥, 龙思博. 制度逻辑: 制度如何塑造人和组织 [M]. 汪少卿, 杜运周, 翟慎霄, 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 [26] OCASIO W.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S1): 187-206
- [27] 张冬冬, 刘建军.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原理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2(3): 1-10
- [28] BESHAROV M L, SMITH W K.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organizations: Explaining their varied nature and implic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3): 364-381
- [29] 马正立, 赵玉胜. 制度逻辑理论建构: 基本原则与整体模型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2(5): 114-128
- [30] 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 一个整体性视角 [J]. 学术月刊, 2014, 46(10): 5-11
- [31]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7, 42(7): 36-50
- [32] 代凯. 注意力分配: 研究政府行为的新视角 [J]. 理论月刊, 2017(3): 107-112
- [33] 周雪光, 艾云.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一个分析框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4): 132-150
- [34] 谢来位. 层层加码与层层递减: 不同类型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权变逻辑 [J]. 求实, 2024(2): 43-55
- [35] 张继亮, 张敏. 横-纵向扩散何以可能: 制度化视角下河长制的创新扩散过程研究: 基于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方法的分析 [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 20(1): 57-68
- [36] 韦影, 王昀. 很复杂, 但更精致: 嵌入式案例研究综述 [J]. 科研管理, 2017, 38(11): 95-102
- [37] 罗伯特·K. 殷. 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 [M]. 周海涛, 史少杰,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183-190

How Can Rural Sports Events Go from a Village to the Center?: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B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 Analysis

ZHANG Jiliang¹, GAO Chen², HE Suyang³, ZHANG Haomiao³

Abstract: Holding rural sports events is not only a basic way to develop rural sports industry and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alize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and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l, this study uses the embedded case study method to analyz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un BA" ev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Cun BA" competition was the joint result of the community logic of the grassroots society, the administrative logic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logic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mong them, individual emotional cohesion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need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rural sports events under the shape of institutional logic, local governments promot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ertical response pressure and horizontal competitive power,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ly included them into national sports events through agenda setting and policy feedback. In this process, media mobilization played a key role in linking institutional logic, condensing social focus and expanding institutional field.

Keywords: "Cun BA";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rural sports ev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uthors' addresses: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00, Shandong,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Liaoning,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Sichuan, China

(上接第 73 页)

Internal-external Synergy and Value Co-creation: The Connot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Events

ZHANG Chunping, LIU Shiyi, WANG Dulan, ZHAO Siyi

Abstract: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a significant vehicl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sports events, jointly driven by endogenous forces within rural areas and exogenous support, now is entering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ac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events. Grounded in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and value co-cre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value co-creation through internal-external synergy. It proposes a systemic cycle of "value co-creation, governance foundation-building, economic value enhancement and cultural feedback," aiming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events through four transformative pathways: from demand fulfillment to value creation, autonomous governance to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subsidy-dependent models to self-sustaining mechanisms, and events hosting to meaning production. The key constraints are identified in current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impediments to value co-creation, imbalances 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limitations in "sports event+" integration,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 events supply.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the following breakthroughs should be sought: value activation by adhering to the farmers' subjectival presence and integrating events value; governance first, through building the events governance community and reaching the internal-external cooperation and co-governance; economic empowerment by advanc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vents+", and strengthening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dapt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 supply and enrich the diversified events system.

Keywords: rural sports even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ternal-external Synergy; value co-creation

Authors' address: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